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2.27

湖南人民出版社

K262.27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湖南农民运动

翻山 衡山 醴陵 长沙 工农兵 党史学习班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长沙

503272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湖南农民运动

韶山、梨山、醴陵、长沙工农兵 党史学习班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7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130·434 定价：0.25元

## 前 言

为了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五十周年，我们搜集整理了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一些史料，编成本书，供读者参考。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作了科学总结，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党奠定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基础，制定了党在农村工作的基本路线，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仍然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批判一切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编写此书，首先是希望系统地介绍一些史实，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深入学习和理解这一光辉著作；其次是想用广大农民群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和取得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一个伟

大的真理：革命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一定要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抓纲治国，继续深入地开展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此书编写工作的，有亲自毛主席考察过农民运动的韶山、衡山、醴陵的四位农民同志，长沙的一位工人同志和驻长部队的一位解放军战士，以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的同志。初稿写出后，承有关单位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缺点和错误仍在所不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韶山 衡山 醴陵 长沙 工农兵党史学习班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

一九七七年二月

## 目 录

一、水深火热中的湖南农民·····	( 1 )
二、革命火种·····	(11)
三、思想和干部准备·····	(25)
四、组织起来·····	(31)
(一) 秘密时期的斗争·····	(31)
(二) 支援北伐战争·····	(33)
(三) 农会组织的大发展·····	(39)
五、暴风骤雨般的农村大革命·····	(47)
(一)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47)
(二)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55)
(三) 经济上打击地主·····	(59)
(四) 扫荡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	(62)
六、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70)
(一) 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70)
(二) 毛泽东同志实地考察五县农民运动·····	(76)
七、农民运动的新阶段·····	(85)
八、十万农军围攻长沙·····	(96)

---

## 一、水深火热中的湖南农民

湖南，地处祖国长江中游、“八百里洞庭”的南面，有着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湘、资、沅、澧四水流贯全境，东、南、西三面环山面向北敞开，形成一个马蹄形盆地，是一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盈的“鱼米之乡”。可是，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这里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帝国主义在中国横冲直撞，各派军阀连年混战，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地主豪绅敲骨吸髓。“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sup>①</sup>

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眼里，中国是一块肥肉，他们穷凶极恶，千方百计想把这块肥肉吞下去。沙皇俄国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中国干下了无数的罪恶勾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俄、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大门，

---

<sup>①</sup>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强盗们一批一批接踵而来，肆无忌惮地侵犯和践踏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一直是帝国主义魔爪掠夺的地方。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外国的商品和鸦片，即通过广东、广西进入湖南。一八九九年，湖南水陆交通要地岳州（现岳阳），首先被英国开埠通商。随后，长沙、湘潭、常德等地，相继被日、美、德等国辟为商埠和轮船寄港地。帝国主义列强攫取了湖南海关税和对外贸易大权，控制了湖南的邮电交通事业。挂着米字旗、膏药旗、星条旗的洋船，就象湖鸭子一样，涌进了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条内河。各种洋货，如潮水般涌入湖南城乡。湖南人民辛勤劳动生产的棉、麻、丝、茶、桐油等农产品，水口山、锡矿山的铅、锌、锑等贵重矿砂，以及湘绣、夏布等特产，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源源流出国外。湖南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榨取原料的市场，一湖四水成了帝国主义在湖南土地上的吸血管。

帝国主义分子在湖南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残酷地压迫着劳动人民。他们逼走居民，霸占土地，建立领事馆、洋行、别墅和果园。在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上，他们霸占的土地，地界很多都是直抵东西两侧的河沿，水陆洲被割裂成若干横块，不留道路给洲上的菜农南北通行。枯水季节，菜农还可绕河滩行走，到了涨水季节，那就只有望河兴叹了。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轮船，在湖南的江河里耀武扬威，肆意撞沉民船，溺毙人命。他们的教堂遍布各地，很多妇女被他们骗去入教，惨遭蹂躏。

帝国主义还利用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培养留



学生等手段，对湖南进行文化侵略。原湘雅医学院的开办者美帝国主义分子胡美，回国后写了一本名叫《道一风同》的书，用中文在书面上写了八个大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赤裸裸地供认了他们在湖南开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真正目的，是要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并为他们侵略中国培养一批驯服的走狗。

帝国主义者为了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等上层建筑力量，纷纷以大量的贷款、军火，大批的军事顾问，分别支持自己所豢养的封建军阀，进行无休止的混战。湖南地当军事要冲，北洋军阀以湖南为攻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以湖南为北进的阵地。因此，南征北战，湖南成了长期拉锯的战场。反动军队在这里派夫派款，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一九一七年冬至一九一八年间，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从日本政府获得两万万日元的卖国借款，在日、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鼓励下，他决计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结果，南北军阀在湖南境内混战，弄得满目疮痍。醴陵在呈请赈恤时说：南军撤退前，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夕，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掳掠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殆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随后又从城市转向乡村，乡村“所有庐舍，大半被毁”。农民的衣服被帐、田畜家禽，几乎全被掠夺。“且杀掠之余，继以淫逼”。军阀混战给广大湖南人民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首民谣，也是旧社会湖南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军阀政府如狼似虎，横征暴敛。从一九二〇年以后的五六年间，在军阀赵恒惕的统治下，湖南田赋的正税已是不轻，而更奇重的则是“田赋附加”。这种附加，往往超过正税数倍。宁乡县每一两银的正税（约相当银元一元多），附加学捐、团防捐、路股捐、农村保护捐共达四元。祁阳县每两竟附加十八元之多。不仅如此，军阀政府还要预征田赋。一九二六年，很多县已预征到一九二八年，有的甚至预征到一九三四年。为了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他们还继承了清朝政府的厘金制度。洋货入口，抽税百分之五，运销内地各省，再缴百分之二点五的所谓子口税，此外不抽任何厘金。而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货物，则要受层层厘卡的剥削，连肩挑小贩，每到一卡，也要抽税。有时一担货要完三担货的税，叫做“两担空，一担实”。岳阳县有个小贩，运了一小木船萝卜，厘卡要征收高出卖价一倍的税款，且拖延时间不给过秤，以致萝卜通通糜烂变质。这个小贩气愤已极，投河自杀了。此外，还有什么屠宰税、烟酒税、土硝税、落地税、亩捐、猪捐、牛捐、鱼捐、蛋捐、窑捐、竹木捐、石灰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奇重的苛捐杂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在农民头上。

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湖南地处祖国内地，封建经济比沿海各省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途径是收取地租。湖南各县，地主夺去佃农劳动果实，一般是五成至六成。长沙、湘潭等地，往往高达七成。湘乡县在丰年时，有的地主竟夺去九成。至于大斗收租，小斗柴出，几乎是通例。湘东、湘中、湘北一带的地主，怕佃农欠交租谷，还兴了一种要先交押规钱（即押金）后进庄耕种的办法。押规金额约相当一年租谷的价款。佃约规定：“如租不清，将规扣除，退田另佃。”地主得了押规，又把它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反复剥削农民。当佃户把田种肥，谷产增多的时候，地主又借故提出退佃的要挟。如果农民要求续佃，就得加租换约。浏阳西乡一地主，只有七十五石原租，经过四年加租换约，竟升到租谷一百石。此外，地主剥削农民，还有很多花样，如规定佃户要给他挑水、晒谷、舂米、送信、讨帐、抬轿以及婚丧嫁娶帮工等无偿劳役，并要随呼随到。有些地主还责令佃户把豆子、红薯、花生、鸡鸭等，优先送他，逢年过节另要送礼，等等。他们竟把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说成是什么“东佃亲如一家”、“东佃如父子”、东家是佃户的“衣食父母”。

地主剥削农民，更为毒辣的是高利盘剥。许多农民迫于生活，只好向地主借贷。借钱，月息百分之十，是全省的普遍现象。慈利、永明（现属江永）、城步等县，月息都是百分之三十。临湘有的地主，规定每日每元利息一角，每满十天即算复利。这样，本加利，利滚利，满一个月须还本利八元。借谷，是借陈还新，即青黄不接时借谷，新熟时归还。一般是借一石

还一石半；有的借一石还两石，叫做“对本对利”。还有许多农民，为济燃眉之急，只得在新谷尚未登场时，向地主预卖新谷。地主则乘机卡着农民贱价出卖。到第二年荒月，他们又故意闭粜，制造粮荒，抬高谷价，农民只好忍痛以高价乞粜。这样，农民以一元多钱一石谷卖给地主，一转手，又以三四元钱一石买回来，吃一石花了两三石。这真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补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剥削人民，是因为有封建政权为他们撑腰。封建政权是地主阶级压迫工农、吮吸人民膏血的工具。官吏与豪绅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地方官兵经常下乡骚扰，催粮逼款，勒索民财，农民说：“巡警丘八一下乡，黎民百姓定遭殃。”地主豪绅仗仗衙门势力，夺产霸妻，为非作歹，任意宰割百姓。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你上诉吗？可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以耒阳为例：人们要上诉，先得向衙门收发处买一张状纸，花高价请人书写，再出钱找铺保盖章，方可送入衙门。待传票发出，警备队便向原告要“酒钱”；到了原告家里，除鱼肉烟酒招待外，还要“草鞋费”。审讯时，差吏要“站堂费”，等等。要花钱的事，农民怎能赛过地主豪绅！何况当时的法律是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农民有理也会被判成无理，最后不免落个破产、坐牢甚至冤屈而死的结局。更为严重的是，地主豪绅无法无天，各霸一方，私设刑堂，任意打骂和残害贫苦农民。农民往往因交不清租谷，还不完欠债，惨死在他们的竹索、木架、站笼、虎头钩、火叉、

水牢、溺人桶等野蛮残酷的毒刑之下。

宗法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压迫农民的重要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族制。各姓都有宗祠，宗祠下面有支祠。各族各祠门口，挂着“修其祖庙，教以人伦”的对联，设有族长，这些人本来是族中的土豪劣绅，他们利用所谓族法家规，残酷地统治本族农民。农民迁移、嫁娶、买卖或典当土地等一切重要事务，都要有族长到场作主。他们气焰嚣张，可以随意给本族农民加上伤害辱祖的罪名，施以打屁股、坐牢、沉潭、活埋等肉刑或死刑。

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阶级专政，总是一面用暴力镇压革命人民，一面用封建思想麻痹广大群众。当时，湖南各地神庙林立，迷信流行，佛教道教泛滥成灾，卜卦、算命、测字、看相、扶乩等邪门左道，遍及穷乡僻壤。各县都有孔庙，长沙还有孔教会、孔道中学。他们把孔丘捧为“至圣先师”，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思想，鼓吹“三纲五常”、上下尊卑的孔孟之道，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妄图使劳动人民听天由命，不要造反。军阀赵恒惕在他的家乡用巨款修建了一座庙宇，竖起孔老二的牌位，可是，在这庙宇的后面，就是他私设的牢房，被他关押吊打过的农民竟达三百余人，充分暴露了这个尊孔派的刽子手面目。

反动阶级竭力维护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又严重地阻碍和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那时，农民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的残酷剥削，地皮也被他们刮薄了。土地贫瘠，塘坝失修，一遇水旱灾害，毫无抵御能力。一九二〇年，湖南在兵灾之后，又遭歉收，谭延闿、赵恒惕政府竟不顾

人民死活，将谷米一百五十万担外运，充作军饷，以至第二年夏，全省大饥，蔓延到二十多个县，饥民多至六、七百万人，饿死二百余万。继大旱之后，一九二二年又发生二十多年所未有的大水灾，滨湖十余县，共倒溃两百多个垅子，致使很多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农民在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忍痛卖儿鬻女。宝庆县农民张玉云，在一九二五年遭旱灾后没有收成，地主李斌卿却逼他交租还债。张玉云夫妇被迫把十二岁的女儿翠妹，卖给李斌卿做丫头。李逼张玉云夫妇写的“卖女契”规定：“自卖之后，任凭斌卿抚养，概不许张姓接送往来。如有伤风病痛，各安天命，倘或因责骂逃走，悬梁自缢，概不与张姓户族及玉云夫妻相涉，日后另行改嫁，凭买主所为，卖者不得异论。”这就是说，张翠妹被卖以后，就成了李斌卿的奴隶，以后被打骂折磨死了，或当作商品卖了，父母和其他亲人都不能过问，而且再不能见生身父母一而了。

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下，辛勤劳动的农民，却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生活。他们吃的是“糠菜半年粮”，有的甚至“禾镰上壁，就冒饭吃”，靠吃树皮、蕨根、苦菜、蒿子和竹笋等充饥。攸县的农民就曾吃过三十多种野生植物，有的饿得实在没法，只好吃“观音土”<sup>①</sup>。他们穿的是“厚的地方千层补，薄的地方肉露身”。寒冬腊月，没有棉被盖衣过夜的，也是四处都有。平江农民说：“吃的薯拌菜，穿的露见背，困在门板上，冬天抱秆（即稻草）盖。”

广大农民过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日子，而那些狠毒的军阀，贪婪的地主，却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富

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的现象，比比皆是。衡山县一个地主叫符杰，每天吃胀了肚皮，不得消化，就叫丫头替他摇“人工消化器”。安仁大地主陈锡南给他老婆买一件金丝毛衣，就用了三百两银子。面对这种吃人的世道，农民们愤愤不平地说：“锄头我不拿，世人都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自己。”

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甘心做牛做马，任人宰割。他们曾多次地英勇起义，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在鸦片战争时期，湖南就有数千人开赴广东，抗击英国的侵略。太平天国的火焰，燃遍整个湖南城乡，大批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者，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具有这种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仅二十世纪头十年，就有多次。一九〇六年十二月，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的农民和矿工数万人，在广大农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并迅即影响到宜春、万载等县。清朝政府忙从江西、江苏、湖南、湖北调集一万余人的军队进行镇压，日、英、德、美等帝国主义也派军舰驶抵岳州，企图进行武装干涉。起义军与清军相持达一月之久，最后被镇压下去，被杀者达万人以上。

浏醴萍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素称湖南“粮仓”的滨湖地区，一九〇九年发生大水灾，不少地方颗粒无收，官绅地主、投机商人乘机牟取暴利。平常米价每石不过二三千文，而一九一〇年三月，骤涨至每石八千文左右。四月十一日，长沙南门外卖水为生的黄贵芬，以他当日卖水所得的八十文，着他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说这八十文中杂有不

通行的钱币，拒不出售。傍晚，黄妻凑足八十文通行币，再去米店时，每升米又涨了数文，仍未买着。她气愤已极，投水自溺了。她的丈夫感到无法活下去，拉着自己的子女一起投河自杀了。这件惨事，当晚传遍全城。十三日，反动政府又逮捕了所谓“领众滋事”的木匠刘永福，饥民们忍无可忍，于是，一万余长沙饥民和流落在长沙的湖南、湖北的灾民，一齐拥向巡府衙门，锯断了旗杆，捣毁了照壁和石狮子，并在一夜之间，将城厢内外各处堆栈和碓房的米，全部抢光。第二天，饥民们焚烧了巡抚衙门，并捣毁了帝国主义在长沙的洋行、栈房。十五日，反动政府调兵遣将，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十余艘军舰，穷凶极恶地进行镇压，暴动的饥民被杀者不计其数。在长沙饥民暴动的影响下，宁乡、益阳、湘潭、浏阳、醴陵、湘阴、岳州等地，都发生了群众性的饥民“抢米”风潮。然而，同长沙一样，都先后被强大的反革命武装镇压下去了。

此外，在这二十世纪头十年中，还有衡州（州治在今衡阳）和辰州（州治在今沅陵）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压迫人民的斗争，宝庆贺金声组织军队起义，等等。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湖南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所有的农民革命斗争都归于失败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 二、革命火种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接着，中国爆发了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sup>②</sup>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党成立后，为了增强本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首先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同志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身份，于一九二二年领导了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粤汉铁路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以及长沙泥木等各个行业的工人，胜利地举行了十多次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同时，也为湘区革命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培养了骨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

<sup>①</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sup>②</sup>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